

提升实力 加快资本账户开放

罗宁

近年来围绕我国是否应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的问题,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展开了火热的辩论,有赞成者,有反对者,也有的认为,开放可以,但需放缓节奏。应当认识到,资本账户开放对我国经济金融改革总体利大于弊,提升实力应对挑战才是关键。

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支持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

目前,我国资本账户直接投资项目实现的基本可兑换,在引进外资以及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截至2013年末,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金额已达到1175.86亿美元,几近2000年FDI实际金额的3倍。同时,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也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406.5亿美元上升至901.7亿美元。已统计的中国境外企业数量在2012年达到21860家,全球投资覆盖率为76.8%。今后资本账户的进一步开放,特别是金融交易领域的人民币自由兑换使用,将有利于我国企业加快对外投资步伐,通过并购等多种方式获取技术、市场和资源便利,打造可持续竞争能力。

对于当前我国正在稳步推进的经济

结构调整而言,资本账户开放也将发挥不可替代的支持与促进作用。一方面,通过支持企业“走出去”,有利于输出过剩产能,有效缓解日益严峻的产能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引进来”的进一步深化以及“走出去”获取的技术、资源,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产业链中低端环节过度竞争、先进制造业等高端环节明显缺乏的格局,为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创造可持续的增长动力。此外,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我国居民也将拥有更加丰富的途径实现资产在品种类别、地域国别等方面的多元化配置,促进家庭财富积累,有效应对境内各种风险因素的冲击,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优化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的结构比例。

开放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接受范围,深化境外人民币使用程度,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步伐。

自2009年正式启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以来,跨境贸易人民币使用从无到有,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的进展。2013年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为4.63万亿元,较上年同比大增57%,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累计为856亿元,较2012年同比增长193%。根据环

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统计,去年10月份国际贸易采用人民币计价及结算的比率增至8.66%,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开放资本账户,拓宽人民币流入、流出渠道,将进一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及国际投资中的地位。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与境外23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累计约257万亿元人民币。可以设想,随着资本账户逐步开放,人民币国际计价、国际支付以及国际投资等职能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延伸,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将为时不远。

开放可能带来几种金融风险

的确,资本账户开放意味着国内外金融市场将进一步打通,资金跨境流动的限制将明显弱化,跨境资本流动的风险加大,国际资本大进大出及资金外逃将可能给国内金融市场带来较大冲击。

一方面,国际资本特别是短期跨境资本追逐套利,流动性强,规模庞大等特征,在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下将给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带来严峻考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内,受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许多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遭受了严重冲击,货币大幅贬值、股市债市急剧下跌。我国经济金融稳定性相对较强,加之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受冲击程度有限。随着资本账户逐步开放,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给我国经济金融的压力将明显加大。

另一方面,资本项目开放可能会引发基于规避境内风险、甚至逃避国内监管等动机的资本外逃,一是可能放大国内金融风险事件造成的影响,导致金融市场

波动幅度进一步加大;二是可能出现更多财富转移现象,对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近年来屡屡出现有关国内富裕阶层向境外转移财富的报道,引发社会各界激烈的讨论,且不论这种财富转移行为的对与错,其对经济金融造成的客观影响不容忽视。

此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资本账户开放将进一步打通境内外金融市场,过去资本管制形成的“防火墙”不复存在,国内金融市场将面临全球系统性风险更为直接的冲击和影响,金融机构等相关市场主体防范外部风险、承受外部冲击、应对内外部多重风险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同时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与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近些年来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的波动,反对资本账户开放的声音再次在市场上流传。退缩防守也许能避免下一次危机的冲击,但从长远看,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的大背景下,依靠资本管制并不能保障国内经济金融的持续稳定,相反还可能因为政府过度的干预与保护,抑制市场主体的成长。面对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我们只能努力提升实力应对挑战,一方面夯实抵御跨境资金流动冲击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加强资本账户管理框架建设,密切监测跨境资本流动状况,构建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体制机制,完善应对跨境资本双向流动的政策预案。我国金融机构也应进一步提升流动性风险防范与管理能力,在把握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业务发展新机遇的同时,积极应对未来的各种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中等收入倍增需要减税让利

马涤明

在人民网推出的《2014年全国两会热点调查》中,收入分配问题关注度排名第四,其中,有90%以上的网友表示对自己收入“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对此,政协委员迟福林表示,在“提低、扩中、限高”的原则下,应把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调节利益关系和收入分配的重点。

一些公务员抱怨收入低,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资,其他群体也对自己收入不满意。国家宏观经济逐年增长,居民收入跑不过宏观经济增长,甚至很多人、一些行业称多年未涨工资或涨幅很小。这等于说,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没给雇员增发太多的薪水。但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也一直在大吐苦水,说经营困难,无力涨薪,甚至承受现有薪酬与社保都很吃力。经济不断增长,但钱去哪了?这个问号与人们抱怨收入增长慢,应该存在一定的关系。

政协委员迟福林认为,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和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基数低也是造成“钱不够花”的重要原因。而笔者认为,以财产性收入带动收入增长,于大多数人来说注定是个相当缓慢的过程。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增加工资。而增加工资的问题,国有部门好办,私营部门不好办。主要问题是增加职工工资会削减企业利润,一是经营者没有积极性,二是即便有心,也恐无力——当前企业税负、社保负担过

重。如果国家能够更多地实施减税,让利于企业和民众,企业便有了给职工加薪的潜力。再有,目前的个税基本沦为工薪税,商品价内税的税制,也是削低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加重消费负担而“不敢花钱”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减轻企业负担,还等于间接减少零售商品和服务的成本,能够推动物价下降或稳定。而从长远所计,还应该改革税制,由商品价内税这种穷人富人无差别纳税的税收制度,逐步转向价外税——以征收所得税、财产税为主。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过快,而国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乃至有国富民弱、政府与民争利之说,这种情况下,政府是否应该大幅减税让利,值得讨论。否则,“提低、扩中”也好,做大中产也罢,恐怕一定时期内只能停留在口号上。如果多数民众都觉得钱不够花,不敢消费,也不利于提振内需,结果是于国于民都不利。

集中财力办大事,一方面确实显示着体制的优越性,而另一方面则是政府工程项目过多,消耗财力太大,且不可避免地出现损失浪费。过多过滥的政府专项资金、项目补贴等等,不但没能发挥应有的效用,反而滋生腐败交易,在基层出现弄虚作假等问题,可谓既劳民又伤财。将这些资金直接转为民生,或作为政府减税让利的支撑,进而转化为民众消费能力,将一举多得,事半功倍。

两会代表委员聚焦楼市四大矛盾



楼市难题积多年,矛盾何止四焦点。十调九空房价涨,七上八下民心悬。土地财政未根治,经济转型难兑现。和尚撞钟误大计,壮士断腕莫拖延。

赵乃育/图 孙勇诗

从提升服务贸易入手迈向贸易强国

张茉楠

2013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达到4.16万亿美元,货物贸易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然而,从价值链的角度看,中国远远落后,这个差距就来自于服务贸易。我国必须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提升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层次的重要抓手,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

统计显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服务贸易规模扩张很快,2003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2000亿美元,2008年突破3000亿美元,2012年达4706亿美元,2013年将超过5200亿美元。同时,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1982年,我国服务贸易的全球占比仅为0.6%,2012年该比例已达到5.6%,居全球第三位。初步预计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全球排名仍将位居第三。

然而,无法回避的是,与发达国家比较而言,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处于严重失衡的局面,连续12年出现逆差,这既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扩大开放、进口增加的原因,也反映出比较服务贸易竞争力,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间存在着明显差距。从服务业发展规律来看,目前服务业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为70%,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比重则达80%左右;服务出口占世界出口占对外贸易出口的比重不足9%。根据商务部统计,“十一五”期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从94亿美元扩大到221亿美元,呈逐年扩大趋势。

当前国际服务贸易日趋知识化、技术化和资本化,世界服务贸易的部门结构已从以自然资源或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行业(如旅游、销售服务等)为主逐步转向以资本密集型的服

务行业(如运输、电讯、金融等)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行业(如专业服务、计算机软件、数据处理等)为主。这正体现了世界服务贸易的结构优化趋势。

而我国服务贸易以旅游、运输等传统行业为主,在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方面较为薄弱,导致我国整体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还处于比较劣势。近年来,尽管中国计算机、保险、金融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增速很快,但在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中比重依然较低。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仍有约一半集中在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领域,而金融、保险、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通讯服务等四类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的服务贸易仅占出口总额的7.6%。中国必须加快贸易方式的转型升级。

未来我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整体经济进入了生产要素成本

周期性上升的阶段,这样工业部门的利润有可能越变越薄,资本回报率将持续下降,出口驱动的增长红利会减少。“资源红利”衰减后经济增长面临资源环境瓶颈。在全球外部不平衡逆转,全球分工体系格局日趋稳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五大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主要源泉难以维持,并将步入递减区域。

这意味着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模式,很难在贸易层次和战略利益上取得突破。我国要通过设计研发创造、品牌价值创造和营销渠道创造等高端服务环节创造利润和资本,而不是“撞墙”转基贸易,实现全产业链整体升级。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两会快评

推进利率市场化 必须打破行业垄断

周俊生

全国两会大幕拉开,来自经济界的代表和委员顿时成了忙人。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银行董事长闫冰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起了他的老本行,他的话题是现在人们高度关注的利率市场化。他说,要推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为中小银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探索优化银行业分类监管机构,以此来推动利率市场化。

改革开放35年,中国金融业的改革步子缓慢,资金融通也成为一种极为昂贵的资源,已经远远落后于实体经济的现实需求。在最近几年实体经济增速下降的背景下,银行业的创利水平却不降反升,中国2900多家上市公司中,16家上市银行所收获的利润居然能够占到一半以上,成为创利能力最强的一个部门。在利率由央行统一规定的情况下,无论是存款人还是贷款人,市场选择显得多余,只能被动地接受银行开出的利率,从而在客观上造成其利益被银行盘剥。比如,居民的存款利率和居民向银行借的房贷和其他大宗消费信贷的利率,两者之间的息差十分巨大,几乎成为世界之最。

银行业盈利过于丰厚,实际上是将实体经济的利润蚕食到了它们的口袋里,而银行之所以能够这样,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它实现了行业垄断。目前,这种垄断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规定存款利率,尽管允许上浮,但又作出了限制,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十分有限,而为了共同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壁垒却坚不可摧。目前,我国的贷款利率已经放开管制,也就是说实现了市场化,但企业却并没有因此享受到利率降低的好处。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存款利率尚未放开管制,制约了贷款利率浮动的空间,但更重要的是,银行业之间所存在的行业垄断使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可能随意降低贷款利率,企业面对这种行业垄断,博弈的手段很有限。

虽然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还没有成为现实,但上海自贸区3月1

期待涉案部门与代表委员良性互动

冯海宁

据报道,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又来了,这一次他将带来一个有关防止滥转转基因作物,对其加强监管的提案。为了这份提案,他花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跑了6个多月时间。在2日的全国政协无党派界别会场,崔永元说,“我自费100多万调研不是因为我是民族英雄,而是因为我‘轴’!农业部等主管部门应该回应我的调研情况,不回应我是他们丢人!”

转基因是个热点话题,而崔永元又是明星委员,当崔永元提案涉及转基因作物,自然会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一大看点。崔永元透露,转基因种植问题很严重,农业部多次重申目前中国没有批准转基因粮食作物商业化种植,但据他的团队调查,4个省份都存在大规模违规种植转基因玉米和水稻的问题。转基因种植监管是否失控?这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不仅崔永元发现转基因违规种植,而且有关专家也早已发现类似现象。比如,2011年中国农科院种业专家佟屏亚明确指出,中国农田里早已经大片地种植转基因作物了,有“违规商业化”玉米,也有转基因水稻。“我国转基因水稻种子的销售渠道已经遍布南方十多个省,并已形成规模种植。”而据我国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虽然部分转基因水稻、玉米获得安全证书,但并不允许大规模种植。

遗憾的是,专家早就“举报”转基因作物违规种植,农业部也曾表示正在调查此事,然而,似乎至今没有公开调查结果。而崔永元这一回再次公

日开始的取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正好可以让我们看到利率市场化给普通储户能够带来什么。在自贸区的这一改革实施之前,央行对外币存款已经允许可以适当浮动利率,只是设置了上限,比如1年期美元存款利率可以上浮至3%,但是,以吸收外币存款为主的中国银行挂出的这一档次利率却只有0.75%。现在取消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后,外币存款在自贸区内实现了完全的市场化,但这几天自贸区内各家银行挂出的外币存款利率并没有什么变化。这说明,由于行业垄断的存在,外币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并没有给自贸区内银行带来什么压力。这固然是由于自贸区内居民外币持有量有限的原因,但它提醒我们,即使未来人民币存款利率实现了市场化,普通储户由于在与银行博弈中的天然劣势,很可能难以享受到这一改革所应释放的红利。

利率市场化不是一个可以单兵突进的改革目标,要让它成为现实,需要一系列配套制度的推行。闫冰竹所说的存款保险制度、分类监管体制等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但除此以外,在银行业引进破产机制,允许民间资本开设民营银行都是不可缺少的改革目标,而培育银行业的竞争机制则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当银行业之间的竞争充分展开,利率市场化才能真正发挥出它所具有的实现存款利率定价的功能。要达到这个目标,关键在于打破银行业之间形成的行业垄断,而不是为了监管的方便强化这种垄断机制。银行业之间的行业垄断是一种客观存在,要打破这种垄断格局,当然需要监管机构改革监管手段,不能为了行业利益而偏袒银行,抑制存贷方的合理利益,但必须看到的是,银行业的行业垄断之所以畅通无阻,一个重要原因正是行业主管部门的推动。而行业垄断一旦形成,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很难有效地与之对垒,这就需要国家的反垄断机构及时介入,用法律的力量来打破银行业之间存在的这种行业垄断的坚冰。

开“举报”或以提案的方式详细“举报”,农业部是否公开回应,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而且,除了转基因作物违规种植外,崔永元的提案还涉及食品双重标准的问题。有关部门应代表委员的提案,但是否回应、如何回应还有待观察。

笔者看来,无论是崔永元的提案花费100多万元调研成本,还是某些代表委员的提案是“零”成本,都应该得到有关部门的积极回应,即使是敏感问题也不能回避。因为一份提案不仅是代表委员的心血,也关乎公共利益和“涉案”部门的公信力。因此,期待每个“涉案”的国家部门,都积极回应代表委员的“举报”,而且回应时间最好在全国两会期间,以便代表委员评价回应效果,若不满意还可以再追问。

数据显示,十一届全国政协立案的提案的办复率达到了99.5%以上,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数据。但是,仍有约0.4%的提案未办复以及约7%的提案未立案。那么,像崔永元关于转基因和食品双重标准的提案,由于问题比较敏感,是否被立案,是否被办复,无疑,是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期待有关方面百分之百立案、办复,让每一份提案变成有效提案,真正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良性互动。

崔永元显然是希望与农业部等主管部门良性互动起来,因为这种互动是双方的一种责任,也是推进法治社会进步的手段之一。考虑到农业部2011年调查转基因作物大规模违规种植至今没有下文,所以,这次崔永元的提案,再次考验着农业部回应提案的勇气。